

第一章

导论 透视近代社会的理想窗口

一、对近代社会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国家，到近代这种性质依旧未变：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构成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因此，不研究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想深刻地了解近代中国是不可能的，要准确地把握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是不可能的。研究、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研究、了解近代中国的变革和革命，都不应该忽视农民和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包罗万象，头绪复杂。诸如农村的土地问题、租佃关系问题、生产技术和劳动条件问题等，均是极重要的问题，也是以往历史学者、社会学者、经济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他们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剖析了中国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加深了人们对农村的认识。

本书选择农民交换、娱乐、社会交际的主要场所——乡村集市作为研究对象。笔者以为，尽管乡村集市不是近代社会的特有现象，但它却是在极度封闭的条件下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的结果。在中国这个几乎全农业性的国度里，乡村集市囊括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更能全面地反映乡村社会的全部现象。芸芸众生在乡村集市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理世界及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集中显露。每一个集市都是一定地区的农

民生产生活的集中反映，都是一定区域乡村社会的缩影。在近代中国新旧蜕变嬗替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乡村集市的形式与内容，自然昭示出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历史趋向。因此，透过在整个社会中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乡村集市的变化发展过程，我们不仅可以发现纯朴善良近乎愚钝的中国农民经济社会活动的丰富多彩，而且从其漫长的渐变之路中，也能隐约可见整个中国社会艰难而踌躇的近代化足迹。

影响乡村集市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般而言，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乡村集市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乡村集市就不发达。但具体言之，从经济的角度看，制约乡村集市发达的直接因素有三：

第一，农民必须有交换的需要与可能。专业性农产品生产的发展、货币需求的增加、余缺调剂的必要等，为农民提供了交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第二，都市经济的影响。都市经济是与乡村经济相对而言的，我们可理解为工业经济，它对乡村影响的主要方式是倾销工业品，吸收农产品，而这种交换多是依靠乡村集市进行的。因此，都市经济的发达与否，程度不同地影响集市的繁荣程度。

第三，自然条件。人口密度、地理位置、物产、交通等自然条件，对乡村集市的分布和繁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乡村地域辽阔，上述三个条件在各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此，乡村集市的发达程度也参差不齐。研究从何处着手，如何从千差万别的乡村集市中寻找其发展变化的规律？选择典型地区作区域性研究，以小见大，历来是乡土研究学者运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从事乡土研究的工作者在具备广博的社会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对所关注的区域材料进行深透的把握和理解，把区域特点剖析得愈深刻，地方色彩愈浓郁，对社会经济有机体网络结构的认识就愈深化，区域之间的关联和比较便愈具体，其学术价

值和社会价值也就愈大。研究乡村社会的著名学者陈翰笙先生，30年代曾选择清苑、无锡、番禺三县作为其研究的典型地区，在《中国的农村研究》中，他这样陈述了研究中国农村的看法：“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彻底地了解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而于挽救中国今日农村的危机，也就不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设计。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先从这三个地方着手，才是扼要的办法。”

本书选择华北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是受学术前辈们对中国乡村卓有成效研究启发的结果，此外，也还有如下两点理由：一是考虑到华北地区在近代中国有一定代表性，二是由于华北地区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

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农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它不像江南发达地区：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生产、手工业生产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至出现商品生产的地位超过了自给性生产，手工业生产的地位超过了农业生产，使市镇经济发达，许多集市发展成为市镇，形成十数里，至多数十里即有市镇的格局。在华北工商业发展较突出的清苑县，其乡村一般没有江南意义的集镇，农民日常买卖主要依靠定期市。它也不像西南等偏僻落后地区，乡村集市稀疏，集市的社会性突出，集市中交换过程简单。如果以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的话，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居于中等。据1921年至1925年的调查，中国北方农村农产品自用和出售部分分别为56.5%和43.5%，华东、华中地区分别为37.2%和62.8%。中国北部农村生活资料自给部分和

购买部分分别为 73.3% 和 26.7%，华中和华南分别为 58.1% 和 41.9%。^①

华北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显然比江南地区低，西南、西北等落后地区虽无量化的数字可资比较，但从其生产力水平看，其农产品商业化程度毫无疑问应低于华北地区。在当时的中国，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发达和不发达之间，其代表意义突出。只有研究的对象具有明显的代表性，研究才能具有社会价值。

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就该课题的性质而言，进行农村调查，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于深入研究至关重要。20 世纪前半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官方的、民间的学术团体、个人，由于种种原因，曾对中国农村进行过广泛的调查，据陈翰笙先生统计，仅在 1931 年前的 14 年间，在国内的 15 个省区内，各式各样的农村调查就达 51 次之多^②。陶诚先生估计，1925 年至 1935 年十年间，有关中国的农村调查不少于 9000 次^③。华北地区邻近统治的中心平、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有关该地区的农村调查较之其他地区更深入、更细致、数量也更多。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曾组织力量，开展对农村的调查，1934 年，陆续发表了江苏、浙江、陕西、河南四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 年在全国设有 6000 多名农情报告员，并编辑出版《农情报告》月刊，每年还出一本汇编。各县、区等地方政府都对农村作过详简不一的调查，如天津社会局 1931 年就曾对东于王庄、小于庄等 18 个村

①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张履鸾译，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75 页，第 525 页。

②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载：《劳动季刊》1 卷 1 号，1931 年 9 月。

③ 陶诚：《30 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

作过调查。铁路部门也开展了对各主要铁路沿线调查，在华北地区，平汉铁路（北平至武汉）沿线、平榆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沿线都有比较详尽的调查报告。

各学术机构、学者对农村调查的更多。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都注重对农村的调查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燕京大学的徐雍舜等曾到北平附近调查乡村领袖的冲突，黄华节等曾到定县调查乡村礼俗和社会组织，李有义等曾到山西徐沟县调查农村社会组织。1934 年，国立北平大学农村经济系对北京西郊的 64 个村进行调查，后由杨汝南主持完成《北平西郊 64 村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反映了 30 年代北京西郊的农村情况，对今天考察乡村集市变化，仍有现实意义。梁漱溟、李景汉、晏阳初等学者，为改变中国农村愚穷弱私的面貌，对农村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写出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报告，他们选择的改良农村实验点——邹平、定县，均位于华北地区。

在这些调查中，李景汉先生主持的定县调查，获得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他在调查中不仅运用了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和文献调查等方法，还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对象，提高了资料的准确性。他 1933 年撰写的《定县社会概括调查》，至今仍是了解当时定县社会一部最完整的参考资料。

中国的农村也引起了来华传教士、服务于中国政府的西方官吏和学者的注意。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曾在山东、河北等省传道 40 多年，系统地观察了各地农村状况，他写的《中国农村生活 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和《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 20 世纪初期出版的有关华北农村重要的两本书。德国学者伐格纳（Wagner）也经过长期调查，写成了《中国农业》（Die Chioesische Landwirtschaft）一书。

民国成立之后，外籍学者运用近代社会调查方法，对华北农

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1917 年清华大学教授低特梅 (C·G·Pittmer) 指导学生对比平西郊 195 家的生活费用进行了调查; 1922 年, 华洋义赈总会请马龙 (C·B·Malone) 和戴乐仁 (J·B·Tayler) 两教授, 领导调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 240 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于 1924 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1921 年至 1925 年, 金陵大学教授卜凯 (Buck, John Lossing) 领导的对中国 7 省 17 县 2886 个农场的调查, 是历时最长, 调查范围最广, 调查项目最详细, 且较科学的农村调查。1930 年用英文出版的《中国农场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一书, 将他调查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总结。30 年代金陵大学接受美国洛克弗洛基金 (Rokefeller Foundation) 的津贴, 由卜凯教授领导调查全国土地利用情况。此外, 卜凯教授所著的《直隶盐山 150 个农场经济和社会的调查》(An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150 Farms, Yenshan County, Chihli Province, China)、《中国之田权与租佃制》(Farm Ownership and Tenancy in China) 和《中国一九三一年水灾调查报告》(The 1931 Flood in China) 对华北地区都有广泛的涉及。马札亚尔先生 1924 年至 1927 年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农村调查, 写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 对中国农村经济, 特别是土地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对研究华北农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40 年代, 杨 (C. K. Yang) 曾以山东邹平县乡村集市为例, 研究过华北地区地方性集市经济情况^①。

谈到对中国农村的调查, 不能不提到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该组织成立于 1906 年 10 月, 从 1908 年到 1945 年, 在长达 40 年

① 参见 C. K. Yang, 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 A summary of a study of periodic markets in Chowpping Hsien, Shantung,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4.

的时间里，曾组织力量，对我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调查的范围，几乎遍及社会经济的所有领域。就农村实态调查而言，日本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调查布点最多，规模最大，出版印行了大量的调查报告。

在华北地区，1936年3月，为了全面掌握冀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情报，组成了“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该班由满铁调查长、日本在华留学生、日军情报人员、冀东汉奸政府成员组成，总人数33人，分为14个小组，从4月22日至5月15日，实地搜集了华北16个县25个村庄的社会经济资料，编写出版了《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四册。他们以县及村庄为单位的“农村一般调查”，包括55个项目100多个有关农村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农户为单位的“农家调查”，包括26个专题调查表和数百个调查项目。调查内容十分详尽。

1937年初，满铁天津事务所对平谷、宝坻、丰润、昌黎等县农村进行为期一月的实地调查，编成《第二次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三册。七七事变后，他们又在丰润、通县、获鹿、彰德等县进行农村调查，其中对丰润米厂村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39年，分别写出了调查报告。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在济南的分支机构，对济南市郊、潍县、泰安市郊、青岛市郊、惠民、临沂等地农村也作了调查，出版了调查报告。

日本的“华北综合调查所”及一些日本学者对华北农村的调查，我们还可以在《石门市近郊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包头附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保定附近农村事情》、《北京近郊农村事情》、《邢台县农村实态调查》等调查报告中得到清楚的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满铁又专门组织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华北开展大规模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从194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4年。他们运用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将调查

项目分为土地法、财产法、债权法及金融法、人事法、自治法、金融工矿业及其他公私法六大类，采用问答的方式，对河北昌黎、顺义、良乡、栾城、山东恩县、历城等六县进行了实地调查。这种以村庄为单位，对中国农村所作的社会经济调查极为详尽。其调查结果，在 50 年代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题出版，共计六大卷。这个调查报告，对于把握“中国农民实际生活中的社会习俗”；了解活生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①具有重大意义。

满铁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对中国农村进行长期的调查，目的是为了侵略，但其调查的结果，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黄宗智先生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②

华北地区丰富的县志，也对各地的物产、民风、民俗等社会经济情况有所记载，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乡村集市兴衰变异的许多东西，是本文的另一主要资料来源。

调查报告和县志在写作编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掺杂作者一些主观的东西。譬如，由于调查的具体目的不同，调查者在编列调查项目、寻找调查对象上，均各有侧重。县志由于受编撰传统的影响，对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简略，对乡村集市的记载和描述往往是大而化之，令人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之感。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不足，但就目前对该时期乡村集市的研究来看，它们无疑是主要资料，其权威性与重要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的调查者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尽管其调查不一定面面

①（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 1 卷，东京岩波书店，1981 年第三次印刷本，第 1 页。

②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 4 月版。

俱到，但态度毕竟是认真的，对史实的反映也是力求准确和真实。其次，调查者都是身临其境对现实情况进行调查，许多事实不仅所闻，而且亲见。调查报告的细与县志的粗，恰可互为补充。此外，在 80 年代后期，笔者曾经参与过南开大学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冀东农村调查这一国家重点课题研究，考察过冀东和华北其他地区，对华北农村有亲身的体验。这不仅深化了我对华北农村的认识，而且还增强了我对有关华北乡村资料的评判能力。

本书将研究的时间跨度限定于 20 世纪前半期，也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后期，原因有二：

第一，在 19 至 20 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实现了空间上的突破，即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深入到了广大的乡村。

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虽然通过鸦片战争用大炮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但由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巨大排他性，其势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局限于沿海口岸、城市，很难深入广大乡村。到世纪之交，西方传教士已逐渐在广大的中国乡村立定了脚跟，帝国主义军队又公然参与对义和团的镇压，并明目张胆地组织联军，直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平、津地区。帝国主义突破了中国乡村的封建篱笆，对中国乡村的影响，特别是对华北乡村的影响才更进一步。

第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清政府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社会变革。

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19 世纪末的戊戌维新和 20 世纪初的清政府“新政”，较之以前的变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深刻。戊戌维新使人震聋发聩，“新政”中的新学取代科举，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乡村社会。一所所新式的学校在广大乡村逐渐取代授徒式的旧式私塾，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气息。从思想观念上动摇了古老的乡村社会，它是中国乡村社会开始新的历程的里程碑。

二、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中国农村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20 世纪前半期，许多有识之士都曾致力于农村的研究与改造。他们创办刊物、报纸，甚至建立实验区，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进行考察探索，试图通过改造农村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但研究者多缺乏对农村联系的、全面的考察，以孤立的、浅表的考察居多。金轮海先生曾对之进行过深刻的批评，他指出：以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为研究对象的，仅仅看到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封建剥削为研究对象的，离开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忽视了整个经济结构，枝枝节节谈农村问题，结果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以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来作研究对象的，忽视了生产的过程，也不能抓到农村问题的核心；以调查农村经济重视客观事实为研究农村问题的方法，往往流于肤浅的结果……除了证明有目共睹的愚穷弱散外，丝毫没有所得。^①

在 30 年代曾大力提倡并组织过对农村社区研究的吴文藻先生，回顾当时的农村研究，也这样说道：“这种以文化为重点的社区研究，还是不很深入的，特别是没有进行阶级结构的分析，实际上没有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本质，因此，这种社区研究，还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②

遍览史陈，当时研究者侧重研究的问题多为土地问题、租佃关系、自然条件、生产技术、封建剥削或单纯的商品生产，而对几乎包含了上述所有问题的乡村集市，却很少涉猎。以《中国农

①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 1937 年版，第 5—6 页。

②吴文藻：《吴文藻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 年第 6 期。

村》杂志为例，该刊自 1934 年 10 月 10 日创刊至 1943 年 6 月被国民党查禁停刊，历时九年，先后出版 102 期，其中直接或间接与乡村集市有关的文章仅区区四篇。^①

建国后，国内研究农村问题的虽多，但对乡村集市这一课题的研究极其有限。有关本世纪前半期乡村集市问题的研究，就论文数量而言，不过十数篇，专著则更难寻觅。

台湾一些学者在研究江南市镇商品经济、研究大陆各省的现代化中，虽间或有所涉及，但多一笔带过，未作专题论述、深入探讨。有限的研究也多局限于一般性的描述介绍，最多只是对局部地区集市进行数量估计。无论从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看，都要求对该课题能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中国乡村集市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也曾吸引一些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三四十年代，除了前述的杨先生对邹平集市作过典型研究外，斯宾塞先生（J. E. Spencer）对四川乡村集市也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性分析。^②但最具代表性的、对研究中国乡村集市最具参考意义的是美国的施坚雅和日本的石源润对中国乡村集市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经济史家施坚雅先生，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新见解，在关于中国乡村集市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极其巨大。他对中国乡村市场体系研究的全面、系统、细致、深刻以及相关理论的科学性，使得他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自 60 年代始，经久不衰。

施氏的重大贡献，首先表现在理论上。他以人文及自然地理特征划分的功能区域（functional regions）代替以政治行政系统划

①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下册，附录，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J. E. Spencer, The Szechuen village fair, *Economic Geography*, vol. 16, 1940.

分的一元性区域 (uniform regions), 创造了“巨区理论”。他特别强调自然环境在区域变动上的影响, 认为中国史的研究不应以整个中华帝国、省区或府、县作为研究单位, 而应以自然地理特征所划分的“巨区”和该等区域的发展“周期”来分析中国历史。他的这一观点, 成为一家之言。

其次表现在研究方法上。施氏运用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 (W·Christaller) 1933 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 以各地商业和其他人文活动中的从属关系来区别各地域为核心地区或边缘地区。把“中地理论”与“巨区理论”结合, 研究中国的基层社会结构、乡村集市, 是一个成功的创举。

在具体的研究中, 他选择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为典型, 以乡村定期市为立足点, 运用“中地理论”、“巨区理论”, 讨论中国乡村的贸易活动和市场网格, 把基层的墟市、大市集、市镇看成一个层级性的连续体, 对集市的空间结构提供了系统的说明。他论证定期市在社区组织中的核心作用, 是他研究中国乡村集市的主要贡献。

但是, 施氏的“巨区理论”只能说是分析中国社会的方法之一。在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过程中, 如果忽视社会政治条件、宗族、伦理等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构成特点和人们消费倾向等因素对集镇分布及交换的影响, 势必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坑。在中国, 绝对不能忽视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施氏在对四川地区乡村集市的典型研究中, 时间跨度大, 未注意近代乡村集市的显著特点。近代集市是由古代集市发展而来的, 同时又植根于近代特有的社会环境之中, 只有将近代乡村集市的变迁置于中国近代化过程这一大背景中来考察, 才能深化对

这一问题的认识。^①

本世纪 70 年代,日本学者石源润曾对河北省的乡村集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以县志为基础,将河北省自明嘉靖年间至民国时期的乡村集市进行了系统的统计,作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对集市的密度、分布状况、彼此间的关系都作了一定的分析。在研究河北地区集市方面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该文对于乡村集市的社会性、经济性分析明显欠缺。而且,由于石氏的资料来源仅限于县志,其对集市的数量分析也只是一机械性的累加,忽视了集市的其他补充形式,其量化数字的局限性十分明显。^② 使人感到美中不足。

总的看来,目前国内外对乡村集市的研究现状提醒人们:从事该课题研究的学者仍然任重而道远,选择乡村集市作为认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大有可为。

然而,“大有可为”并非前途坦荡,作为学术研究,对近代乡村集市进行深入探讨的主要难度,首先表现在材料的收集上。除满铁的调查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外,前述众多的农村调查报告,不是以慈善救济为目的,便是以改良农业为目的,大多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侧重于生产而忽视生产关系,因此几乎找不到有关集市的专题调查,乡村集市的有关内容,多夹杂于商品化农产、税收或农家生活等条目中。即使以详尽著称的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也只在“债权法及金融法”“财产法”等类项目中,体现有关乡村集市的一鳞片爪。至于县志,关于乡村

① 有关施氏的理论参见:G·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1977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II. and III.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4, No. 1 (Nov. 1964); Vol. 24, No. 2 (Feb. 1965); Vol. 24, No. 3 (May. 1965).

② 石源润:《河北省における明・清・民国時代の定期市》,《地理学评论》, 46-4, 1973年。

集市的记载，详尽者，能列举集市的名称、集期、交换的主要物产及集市的大致概况，略者只述集市名称。有的甚至连集市名也省略了，使人除了明白该县有集市存在外，其余则不甚了了。因此，从收集资料上看，要研究好这一课题，不仅要从事众多的县志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当时农村的实地调查报告中寻找发掘有关资料，还必须广泛地查阅众多的报纸、刊物及民俗学资料。以大海捞针形容，不足为过。

从材料的极度零散，无任何系统资料可资参考的角度言，以往研究者对该问题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们经艰苦细致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不但成为我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其对困难所具有的不畏之勇气和对学术的献身开拓精神，更令我钦佩。它是我能摒弃杂念，而甘愿独处斗室，致力于这一课题研究的精神支柱。

乡村集市不单是商业活动的空间经济体系，还是地方社区的社会文化体系。如果仅仅满足于认识乡村集市，只需广泛地搜集材料，对乡村集市的分布状态、活动规律、交换场面、管理手段等不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是，如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下去，揭示乡村集市的文化、经济、社会、历史背景，总结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在整个社会进步当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除了要求研究工作者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外，还须具备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甚至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之中，至今尚是一种不多见的现象。该课题要求研究者知识面广博，无疑是摆在传统史学工作者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笔者不嫌浅陋，孜孜而致力于这一具有相当难度课题研究，是考虑到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科学工作者只要本着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具备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勇往直前的精神，科学才能不断发展，文化才会日益繁荣。笔者倾其所能，对该课题

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以及不厌其烦地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如能给社会、给学术带来锱铢之益，或引起争鸣，便是最大的愿望和满足。

三、现代科学的启示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甚至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问题曾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个科学。”^①1914年，列宁就此问题也说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加强大了。”^②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宏观研究时，可以借鉴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如经济学家将数学模型运用于研究之中，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结合的巨大优越性。

各门学科的理论各有特点，研究方法各有所长，结合课题的特点，广泛地采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之长处，不囿于陈见，不流于片面，于学科研究的突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许多课题具有边际性，即它既可成为此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又可成为彼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运用任何单一的学科理论对之进行研究，都只能是对其某一方面的侧重，收不到全面的深刻的效果。在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边际性，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学科界线，如果学科之间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92页。

②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缺乏沟通，就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研究的真空。至今这些真空仍广泛地存在。因此，无论从深化对问题的研究还是填补科学研究的空白看，广泛地扩展知识面，掌握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每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至今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它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它又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学说，能撷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它不但与现代科学的方法不相矛盾，而且能兼容现代科学中的珍贵的成果。摆在历史工作者面前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与现代科学理论方法谁是谁非问题，而是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确地运用这些方法深化对历史事实、历史现象的研究的问题。

近代乡村集市问题，就课题的性质而言也具有边际性，尤其将它置于社会结构中来考察，其边际性特点更为突出。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现象，它是各种历史因素促成的结果，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是乡村社会的表现形态，乡村社会的物质存在形式，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集市社区构成的。集市社区中包含着乡村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乡村集市呈现着不同的特点。它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基层，最具乡村社会的代表性，其变化发展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是广大乡民进行交换的主要场所，是农村经济、商品经济发达与否的理想探测器，对农村中的生产、社会分工、农民生活程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民俗学的角度看，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风土民情，在集市中有较集中的体现。从地理学的角度看，集市规模的大小，网点分布的疏密，与各种地理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理论方法，运用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统计学、系统论等相关知识，对问题进行综合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本书的理论基础。从这一理论出发，对乡村集市发生的前因后果、发展进程进行分析，揭示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寻找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乡村集市在整个社会结构系统中，属于社会基层结构的代表，同时在乡村这一基层面，它又具有代表性和综合性。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的大系统中，它是一部分，属于子系统，在乡村中，集市社区本身又具有内部的系统性。集市社区系统的稳定性决定着社会系统的稳定，集市社区系统内部的变化也影响整个社会的变迁。在这里，运用系统论的有关方法就可显示出其他方法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将历史事实、历史现象量化，可以更直观、更简洁地说明有关问题。本文也采用了统计学的有关办法，对一些史实进行了图表化，将描述语言与图表有机地结合，深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有关乡村集市的材料零碎而复杂，研究中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种是侧重于具体事实的描述，停留于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对材料的说明阶段。忽视理论的升华，往往陷于支离破碎，找不到问题的中心。研究者在进行农村调查，整理各种零碎材料，然后用归纳的方法认识中国农村整个经济结构方面下了大功夫，结果提出的无非是集市的交换方式、交换内容、集期之类的肤浅问题。除了证明有目共睹的近代集市中封建因素大量存在之外，丝毫不能有其他说明。只有进而运用有关理论，站在理论的高度，才能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进行深刻的认识。

另一种是沉湎于抽象理论的探讨，而忽视具体史实，畏惧做艰苦细致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往往是隔靴搔痒，空泛议论，不能把握乡村集市的特性。如在近代，许多乡村因为破产，贫苦的小农被迫出售米、麦，改用杂粮充饥。有的为了交租纳税，收获